

《全元文》校读

薛瑞兆

摘要：《全元文》是近年来古籍整理研究的重大成果。以其包罗宏富、规模宏大，泽惠学人，但正因其规模浩大，难免美中不足，本文指出其混入金人作品、署名不当、漏辑、版本选择不善四个方面的问题，为完善该书献一己之力。

关键词：全元文；校刊；辑补；底本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10)04-0021-05

《全元文》是近年来古籍整理研究领域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全书“搜集有元一代之汉文单篇散文、骈文和诗词曲以外的韵文”^①，所载作者约多于三千人，文章约多于三万篇，总字数约在三千万字左右^②，堪称包罗宏富、规模宏大，功德无量，其荣获国家教育部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当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我对《全元文》有几分特别关注。一是1987年春，李先生应王季思、黄天骥二位教授之邀，赴穗主持我的博士论文答辩。那时先生正值壮年，已着手《全元文》编纂事宜；二是我自毕业后，一直从事金元文献整理，与元代文章总集关系紧密。其间，曾受先生委托，代为查阅黑龙江省有关图书馆收藏的元人别集版本情况。可以说，《全元文》从计划到出版，我几乎关注了20余年。

一个重大学术项目的完成，是以学者无数心血与无价年华的消耗为代价的。长久以来，李先生既要宏观到微观把握全书的设计，又要协调方方面面，争取理解与支持；不仅组织和指导同仁展开研究，自己也全身心投入，不断解决研究中的各种问题。可以说，李先生及其同仁为之付出了难以计数的艰辛。同时，《全元文》的经历再次证明，学术研究必须遵循厚积薄发的规律，建立在矢志不渝的理想追求与献身精神的基础之上。惟其如此，才能遏制时下盛行的浮躁之风。

当然，学术研究没有终点。《全元文》也需要

通过讨论，集思广益，总结经验，逐步完善。基于此，本文拟提出几个具体问题，以求教于方家。

金人作品时有混入

编纂一代文献，如何与前后朝代划界衔接，是个仁者见仁的问题。如金元之交的元好问、刘祁等等，已入《金史·艺文志》，而各自又在元初文坛活跃了一段时间，怎样处理？《全元文·凡例》以“原金朝管辖区作家以金哀宗天兴三年（1234）为上限”，凡“金元之交的作者，1190年及以后出生者，一般入元”^③。规定明确。因此，只要依据合理即可成立。而这里的所谓“误收”，均系个案，多属于对撰者缺乏了解所致，也是断代文献研究中通见的局限之一。现举例如下：

吴章《祭长春真人文》（22册287页），辑自元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2，小传仅寥寥数字：“号定庵，元太宗时在世”。今按：吴章字德明，号定庵，太原石州人。金章宗承安二年进士，累官大理少卿^④、翰林学士。同全真道教领袖丘处机交往，元好问尝从之问学^⑤。丙午（蒙古定宗元年、1246）春卒^⑥，寿约七、八十岁。吴章与王若虚同年及第，俱为金代后期翰林词臣，俱以前朝遗老自居，俱亡

①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凡例》，《全元文》卷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册，第1页。

②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前言》，《全元文》卷首，第2页。

收稿日期：2009-06-01

作者简介：薛瑞兆（1947-），黑龙江大学中国古代戏曲与宋金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③李修生《全元文前言》，第1册。第4页。

④元熊梦得《析津志辑佚》：修真院碑，“大理少卿吴章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85页。

⑤《（成化）山西通志》卷9《人物》：“希尹力学，知名当世，大定间登进士第，官至同知陕西东路转运使……男从子章，亦第进士，仕至翰林院学士，元遗山尝受学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1996年，第324页。

⑥元李庭《寓庵集》卷2《挽吴德明》云：“公太原石州人，承安初中乙科。崇庆末始赴召，南渡回。丙午春捐馆，竟不曾还家。”藕香零拾本，中华书局，2000年，第323页。

于蒙古铁骑抚定中原之初，如溥南王氏的作品不收，那么定庵吴氏亦当如之。

陈规《条陈八事疏》（39册496页），辑自《（同治）稷山县志》卷8，小传云：“字养直，奉化人。从戴表元学，为司谏。”**今按：**此疏钞自《金史》卷109《陈规传》，文字毫爽不差。稷山县志收其奏章，以示地方卓有人物。此陈规字正叔，当作稷山人，而非“奉化人”，与“戴表元”了不相涉。陈规登明昌五年词赋进士第。金朝南渡后，仕为监察御史。贞佑四年，以上书言时政得失忤宣宗旨，谪徐州帅府经历。正大初，召为右司谏，以直谏名著当时。六年，出为中京副留守，未赴，卒于围城，年59^①。史称为人刚毅质实，有古人风，笃于学问，至老不废云。

王炎《福山县令题名记》（58册462页）。辑自《（康熙）登州府志》，另以《（康熙）福山县志》所收校勘。小传云：“王炎，济南人。至正年间任福山县尹，文章雅重一时。”**今按：**清张金吾《金文最》卷22亦收，题下注“贞元元年”，与文末“贞元元年夏四月记”合。贞元，金海陵王年号之一。另，文中有云：“阜昌中……迄于今二十余载，凡更六令矣。”阜昌，指大金册封的齐国皇帝刘豫年号，起于天会八年（1130），止于天眷元年（1138）。以“阜昌初”计，至贞元元年（1153），正所谓“二十余载”。由此可见，王炎系金代前期文人，入《金文最》不误，入《全元文》则误。

杨汉卿《重修微子庙记》（59册219页），辑自《（雍正）山西通志》卷204，小传仅三字：“潞州人”。**今按：**《金文最》卷66亦收，题下注“天德三年”，与文末“天德三年九月重九日记”合。天德，亦金海陵王年号。而《（雍正）山西通志》漏钞结尾年月，失注撰者时代。杨汉卿尝为永济县重修夷齐祠书唐人韩愈《伯夷颂》，自称“上党杨汉卿”，时在“皇统己巳”。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19录文，案云：“皇统己巳，金熙宗皇统九年。是年十二月，海陵弑熙宗而立，改元天德。碑立七月，故仍称皇统。末题‘上党杨汉卿书’，不言何官。以碑文考之，盖亦宦于蒲者”^②。《（成化）山西通志》卷14收其文，撰者名下注为“县令”。

宋九嘉《集种师道赵天佑冯叔献诸作勒石序》（59册325页），辑自《（雍正）高陵县志》卷8，小传云：“隃县（原注：今山东夏县）人。官奉政大夫、高陵县尹。”**今按：**宋九嘉字飞卿，夏津（今山东夏县）人。金卫绍王崇庆二年进士。历蓝田、高陵、扶风、三水等关中四县令，咸以能称。入为

南京右警巡使、翰林应奉。正大中，以疾去官，歿于“癸巳”（1233）金亡之难^③。史称性刚直豪迈，为文有奇气，与雷渊、李经相伯仲^④。至于文题之“冯叔献”，指冯璧，字叔献，尝仕为翰林修撰，《金史》有传。序尊称之“公”，有云：“九嘉求学京师时，公在翰林，实与之游而兄事之，惟谨礼有加于师。”亦与史合。至于所谓“隃县”，当指雁门，即今山西代县，与山东夏县无涉。

石为楷（59册343页）。小传谓“生平行踪曾至山西文水一带”，收其《水文龙堂记》，辑自《（雍正）山西通志》。**今按：**《（成化）山西通志》卷14、《（康熙）文水县志》卷10亦收，撰者名下俱注“金醋务都监”。另《（光绪）山西通志》卷95《金石记》云：“文水神祠，一曰文水龙堂，金邑令耶律忠亦祷尔辄应建，醋务都监石为楷撰记。”

曹望之《清白堂记》（59册479页），辑自《（成化）山西通志》，原署“元绛阳军节度副使”，小传谓“生平不详”。**今按：**曹望之字景箫，临潢人。天会间，以秀民子选充女真字学生，业成除西京大同教授。海陵王篡立后，仕为“绛阳军节度副使”^⑤，赐进士及第。后官至户部尚书。另，《清白堂记》所涉“杨子益”，系正隆二年闻喜县令，以勤政廉洁称，邑人因立碑颂其事迹^⑥，后官至西京留守。大定中，金世宗以大理卿职阙，命宰臣选可授者，左丞张汝弼举荐子益法律详明。上曰：“子益虽明法，而用心不正，岂可以任之以分天下是非也？大理须用公正人”^⑦。子益治理郡县有政声，而荐于朝廷，却以用心不正遭否定，前后判若两人。然史载语焉不详，或以其尝为海陵王信用、牵涉当时宫廷政治斗争之故。

孔天监《洪洞县学藏书记》（59册549页），辑自《（雍正）山西通志》，小传谓“洪洞（今属山西）人”，余无考。**今按：**清张金吾《金文最》卷28亦收，撰者名作“天监”，除文题略去“洪洞县”三字外，通篇无差异。另，文末附案语，以间接资料考辨孔天监为金人，云：“《山西通志》列入元，误。”另，见于记载，孔氏亦撰《襄陵县创修庙学记》，“且谓仆乡人业儒之先在仕者”^⑧，透出其乡籍乃襄陵。此外，《遗山先生文集》卷39《曹南商氏千秋录》涉及，称之“同知临洮府事兼积石州刺史平阳孔天监伟明”。由此可见，孔天监字伟明，平阳襄陵人，累官同知临洮府事兼积石州刺史。

①金段成己《中议大夫中京副留守陈规墓表》，见清张金吾《金文最》卷109，中华书局，1990年，第1566页。

②《山右石刻丛编》卷19，历代碑志丛书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5册，第778页。

③《中州集》卷6《宋内翰九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第311页。

④《金史》卷126《文艺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736页。

⑤《金史》卷92《曹望之传》，第2035页。

⑥《（成化）山西通志》卷8《名宦》，第245页。

⑦《金史》卷120《世戚传》，第2626页。

⑧《金文最》卷28，中华书局，1990年，第384页。

以上所举，多非金元易代之际人物，而是生活在女真王朝统治之下的大金文士。

署名不当屡见发生

这部总集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特别是名不见经传的作者比较多，由于资料不足，或研究不够，易于造成新的讹误。这里有几种情况：

一是名异而人同。如杨奂（1册125页）与杨英（59册481页）。杨奂名下辑文七篇，乃金末元初著名文人；而杨英则比较陌生，小传仅“至大间在世”数字，收其《投金龙玉册纪事》，辑自《古今图书集成》。此外，还有《京兆刘处士墓》，署名或有抵牾，《金文最》归“杨英”，《全元文》属“杨奂”，均辑自“石刻拓本”，未见考辨。实际上，杨奂即杨英，号紫阳。元姚燧《牧庵集》卷31《跋张梦卿所藏紫阳先生墨迹》云：

初名焕，后由上金季主《河朔中兴颂》，季主壮之，置红篋中。黄龙战北，红篋为我元所获，恐踪迹物色姓名获戾，宜避更为奂。及后受我太宗简文制，误奂为英，遂不敢私更，始就名英。

姚燧为杨奂之婿、元初著名翰林词臣，所言当不诬。文中“戊申春二月”云云，指蒙古定宗三年（1248），其时尚未建国号，故以干支纪年。

再如弋穀英（22册471页）与弋穀（28册6页）。弋穀英名下收《新修玉真观记》一篇，辑自陈垣《道家金石略》。小传谓“元世祖至元时在世。在华阳、太原两路任职”；弋穀名下收文五篇。**今按：**弋穀英与弋穀亦同一人。弋穀英，或名穀，字唐佐，汝州梁县人。尝师事程内翰天益，两赴帘试，金末以功授本州岛防御副使。金亡后，以博学老儒，选授太原路提举学校官，著有《集诸家通鉴节要》120卷传世，元好问为序^①，称其“文学行义，高出时辈”^②。另，《（光绪）山西通志》卷96《金石记》著录与弋氏有关的二篇碑记：一是《亚岳庙灵应记》，系蒙古癸丑、申鼎撰，“汝阳进士弋穀英书丹”；一是《沁州长官赠沁阳公杜丰祠堂记》，系蒙古丙辰、弋穀撰。原案曰：“撰文之‘弋穀’，碑书为‘弋穀英’，盖出仕时省其一字也。”

二是名同而人异。如王好古（28册596页），收《此事难知序》、《医垒元戎》序与跋、《汤液本草序》，及《重修德风亭记》、《宣慰同知宁德祖舍田碑记》等六篇。**今按：**王好古字进之，号海藏，赵州人。性明敏，通经史，好医方。以进士及第，仕为本州岛教授。先是与东垣李杲同游洁古老人张元素之门，后复师东垣，精研诸家医书，遂为着名医家。实际上，赵州王好古的著述提供了时代依据。如《医垒元戎跋》云：“是书已成于辛卯，

至丁酉春，为人阴取之，元稿已绝，更无余本”^③，后追忆复完。辛卯，正大八年（1231）；丁酉，蒙古太宗九年（1237）。另，《伊尹汤液仲景广为大法序》署“甲午夏六月”^④，即天兴三年（1234），是年金亡。另，《阴证略例》跋云：“予作《阴证论》一书，其本有三，有多寡之异焉，非固如是之不同也。”最后之第三本，“自壬辰至丙申，几五载，而复增随条并药后断例”^⑤。壬辰，金天兴元年（1232）；丙申，蒙古太宗八年（1236）。至癸卯岁，即蒙古太宗乃马真后称制二年（1243），名士麻革为序，引金王若虚赞曰：“世所未闻”^⑥。另，《汤液本草序》谓，该书成于丙午夏、刊于戊申夏。丙午，蒙古定宗元年（1246）；戊申，定宗三年。此后不久，海藏老人离开了人世。至于《重修德风亭记》，辑自《（雍正）山西通志》，《（光绪）山西通志》卷96《金石记》亦著录，云：“亭为唐明皇为潞州别驾时故居，久圯。至正辛巳，张瞻甫来知潞州，始重葺，为燕游地。有陈中立记。又亭落成之日，其地出甘泉，名曰玉露，王好古别为文记之。”至正辛巳，即至正二年（1342），去金元易代之际百余载，与海藏老人决非一人。另，《宣慰同知宁德祖舍田碑记》辑自《（乾隆）孟县志》，题下注“至正十一年”，亦在元末。因此，这位王好古当是晋人，或仕宦山西，与赵州医家相去甚远，不过同姓名而已。

三是有关撰者的信息失检或失考。如“司德义”（20册498页），收文二篇：《重修雹珠路记》，撰于至元二十三年，辑自《（民国）林县志》；《彰德路汤阴县鹿楼村创修隆兴观碑铭》，撰于大德四年，辑自陈垣《道家金石略》。小传云：“全真教道士，道号通玄崇正弘教大师。彰德路林州（今河南林县）林虑宫主持讲师，彰德路坛讲师。”**今按：**《道家金石略》录文署“司马德义撰”，而非“司义德”。另，《（民国）林县志》又著录司马德义《林州九皋山嘉泽观碑》，撰于元贞元年；同时收李诚《栖霞观记》，撰于元贞元年，文中有云：“惟师弟基创之勤，恐遂湮遗，无所闻知，因出正义大师司马敬仲所述是观源委状及九峰名记见示”。由此可见，司马敬仲即司马德义，姓“司马”而非“司”，名德义字敬仲，名与字互为表里。至于“主持讲师”云云，当作“住持讲师”，实际所署也如此。住持，系道士从释徒那里引入的说法，所谓安住于世而保持法也，后引伸为一寺之主僧，或一观之道长。

③《医垒元戎》卷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日]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卷51《方论》，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年。今按：《全元文》未收此序。

⑤《阴证略例》卷末，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今按：《全元文》未收此跋。

⑥同上卷首。今按：《全元文》未收此序。

①《遗山先生文集》卷36《集诸家通鉴节要序》，四部丛刊本。

②《遗山先生文集》卷24《临海弋公阡表》，四部丛刊本。

再如帖木儿不花,收其《河东陕西分界食盐疏》(59册433页),辑自《(雍正)山西通志》,小传谓“至元中官御史”。**今按:**《(成化)山西通志》卷14载有帖陆迺补花《重修祝融庙记》,撰于至正十四年,名下注“元知州”,以庙建在辽州,当是那里的官长。帖陆迺补花,或帖木儿不花,字音相近,皆系蒙古语之汉语音译,字无定形,当是一人。所谓“至元”,指后至元,与“至正”俱为元顺帝年号。由此似可推测,帖陆迺补花在顺帝朝尝官御史,后外放知州。

再如张璠,收其《建立天地水三官庙记》(59册154页),辑自《(民国)修武县志》,小传谓“元顺帝至元中为清涧主簿兼尉(《(顺治)清涧县志》),官至承事郎集贤院都事(《(民国)巩县志》)”。至正二十五年,寓居修武。”应该说,为一位八百年前的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撰写履历,而且从两处方志寻觅数据,实属不易。而撰者名前原冠有“长平东鄙儒人”^①,透出乡贯所在,也是小传不应丢失的内容。

文章辑佚或失悉心

《全元文·前言》有云:《全元文》的‘全’字,说明了本书的规模要求,但在实际编纂中,是很难做到‘全’的。如已出版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唐文》、《全唐诗》、《全辽文》、《全元散曲》等都不全。《全唐诗》编得不错,排印本一出版,立刻有补遗,而且数量不少;《四库全书》名曰‘全’,实际是不全。全,为何还有存目?何况存目之外,还有未列入者。元代研究基础较唐代弱得多。重编《全唐诗》有不少前人成果可以利用,《全元文》就没有这个条件,因此困难程度也更大。《全元文》将出现的问题会很多,这已是一些关心此书的学者意料中事。我们从未忘记这一点。我们要做的祇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减少错漏问题。我们计划在全书编纂校点工作完成后,与编制本书各类索引的同时,再编一部《全元文补正》,附于全书之后^②。

应该说,李先生对“全”的认识是客观,令人信服的。而且,字里行间透出的谦逊态度与求是精神,亦令人崇敬。自1988-1992年,李先生及其同仁先行编纂《国内所藏元人文集版本目录》,为《全元文》项目的实施创造了必要条件。可以说,充分搜罗现存元人集部文献,择取最佳版本,构成了自身的显著特色之一。此外,仍注重从方志与金石等其它文献中辑佚散落篇什,积累日久,遂造就支撑

一代宏大文章总集的基础,由此惠及当代与未来学子。从这样的意义说,所谓功德,是由最终目标与实现过程而显示出来的。

应当指出的是,“元代研究基础较唐代弱得多”,因而面临的问题纷繁复杂,需要付出极大努力。同时,作为“集体”项目,参与者自然不少,而各自的学术修养、志趣等,往往参差不齐,偶有疏失也在所难免。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检索不悉心。

如罗振玉《金石萃编未刻稿》二卷^③,专收元代碑文,虽从中辑得若干,遗佚却不少。今试列目如下。卷上部分:王博文《题名》;陈万里《芜湖县学重修学记》;释普瑞《圆济兰若碑题记》;佚名《西行记》;阎复等《敕赠汉阳大别山禹庙碑》;许有壬《敕赠汉阳大别山禹庙碑阴题记》;孔克坚《大元勅赐曲阜孔庙田宅记》;陈思忠《时公重刊王辅嗣墓碑》;释普祥《创建妙湛寺碑记》;贾文昌《古缙氏县重修泰山庙记》。卷下部分:佚名《重绘圣像记》;孔思立《代祀记》;钱公辅《义田记》;唐道明《玺书碑阴题记》;孔克坚《济宁路重修文庙碑》;贾贲《晋宁镇靖明惠夫人忠烈庙记》;释圆护《妙观和尚道行碑铭》、《建感通峨嵋兰若记》等。

再如《(成化)山西通志》,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元人文章,由于检索粗疏,竟漏辑30余篇。具体情况如下:卷12:秦执中《乐平重修宣圣庙记》;席公举《代州重修庙学记》;赵永禧《永和县重修庙学记》;陈绎曾《沁州麟山孔子庙记》;房希文《夏县重修宣圣庙记》、《神龙祠记》;元凯《高平县学田记》;王士元《首阳书院记》、《泽州高平县永禄里学馆记》;蒋堂《首阳山赋》;王利用《故镇国上将军绛州节度使刘公墓碑》。卷14:吕梦得《重修晋文公祠记》;夏以忠《中镇祀香记》;杜敏《中镇祀香记》;王武《中镇祀香记》;王纬《重修武安王庙记》、《重修盐池神庙碑》;郝翔《重修芮王庙记》;李好文《代祀河渚记》;木寅《故宋枢密使狄武襄公祠堂记》;任戴《高平尹郭先生画像记》;宋绍昌《高平县尹郭先生祠堂记》。卷15:吕思诚《寿圣寺记》、《天宁寺重修大悲阁记》、《重修清微观记》、《玉真观记》;张翼《重修慈广寺碑文》;刘怡《崇玄观记》;耿元益《关虎左辖二公勋德之碑》;刘英《改正翼城县繆事》。

再如《元文类》(或称《国朝文类》)系元苏天爵所编当代诗文总集,也是《全元文》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笔者仅就部分作者复核,发现漏辑现象未能杜绝。如卷9徒单公履及其《建国号诏》、卷10《皇太子册文》、卷38《书张侯言行录后》、卷18李洞及其《潘云谷墨赞》、卷45修端及其《辨辽宋金正统》、卷47康煜及其《谢严东平赐马启》

①《(民国)修武县志》卷13《金石》,中国方志丛书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379页。

②李修生《全元文前言》,《全元文》卷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册,第4页。

③《石刻史料新编》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第1辑,第5册。

等等，均未收入。

再如台北成文出版社编印的《中国方志丛书》，也是《全文元》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检而漏辑问题依旧严重。现举数例：（1）《（民国）新修阆乡县志》卷20《文征》所载杨英《梦游轩记》，是《还山遗稿》失收的一篇重要碑记，清钱大昕《天一阁碑目》、吴式芬《攷古录》等均著录，最终还是遗收了。（2）《（乾隆）杞县志》卷21《艺文志》收元文三篇：刘方《万户张公城杞碑》、傅汝庸《建廨营碑记》、杨惠《樵楼记》^①。其中傅、杨二人文章俱漏辑。（3）《（乾隆）秦州志》卷12《艺文》收元文二篇：张仲舒《新建西江灵济庙记》、乔宗亮《三皇庙记》。其中乔宗亮文章失收。（4）《（道光）武陟县志》卷21《碑碣志》所载王承式《创建商汤王庙三门记》失收^②。（5）忽都鲁沙《黑水龙王湫庙记》，见于《（康熙）隆德县志》卷上，撰者是个蒙古人，官“武德将军开城州达鲁花赤奥鲁劝农事”^③，而此公的文章也漏辑。

总之，编纂一代文章总集，偶有疏失是可以理解的。任何个人或组织都难以超越客观条件的种种制约，也就是说，谁也无法读尽天下书。问题在于，已经检索过的文献，由于不悉心，又造成新的大面积遗佚。笔者因编纂金代文章总集需要，曾检索《中国方志丛刊》所收淮河以北部分，随手记录了元人文章篇目。后来与《全文元》“索引”对照，发现其中漏辑竟达数百篇。如检索淮河以南部分，不知结果将会如何。

版本选择亦见不善

版本选择问题在集部辑录中有所反映，不甚突出，主要表现在零散篇什方面。以其零散，在全书所占比例不大，似未予重视。如不同方志所载同一作者的同题文章，或想当然地以为雷同，问题也就络绎重出了。例如黄理仙《牛山忠惠王庙记》（58册732页），小传作“至正十四年任兴安州学正”，辑自《（民国）续陕西通志》。而续通志所收乃节录，见诸《陕西金石志》、《兴安府志》、《兴安州志》等，亦如之。原碑现存，其文字与诸方志、金石志差异甚大，自上世纪70年代移入西安碑林^④，署“兴元路儒学正蒲田黄理仙撰”，则撰者系蒲田人，官“兴元路”学正，而非“兴安州”学正。“兴元路”为元代建置，隶陕西行省，与此碑书丹、篆额

者衔名所冠“兴元路”合。所谓“兴安州”，明代万历年间始设。方志纂修者不考，遂讹传至今。

再如王士熙（22册159页），收文16篇，甚为不易。其中，《广平路创建善政楼记》辑自《（嘉靖）广平府志》，注为“节文”。所谓善政楼，当建于广平路之倚郭永年，因此，《永年县志》亦收，为全文^⑤。一般讲，早出方志所载比较详实，由于种种原因，晚出方志亦不乏青出于兰。如在检索中忽略这种可能，就会留下遗憾。

再如关思义（51册471页），其《真定路宣差妥屹帖木儿通议公惠政碑》辑自《（万历）新乐县志》，缺略较多。而《（民国）重修新乐县志》卷五《艺文》所收，无甚阙字，所据当是善本拓片。以看似雷同，遂错过选作底本或据以校补的机会。

再如贾鲁（46册44页），其《重修夫子庙记略》辑自《（乾隆）直隶绛州志》，为节本，与题目相称。这篇文章亦见于《（成化）山西通志》卷12，题目作《绛州重修夫子庙记》^⑥，乃全本。类似问题不少，限于篇幅，不再例举。

此外，重收现象未能杜绝。如段辅及其《二妙集跋》，分别出现在第31册与第54册，全书《索引》已经暴露，属于“公开”的。至于“隐蔽”的，如敬铉《李伯甫政绩》与《顺天府路涑水县长官李君宣化之文》，两者的文字无甚差异，均辑自《（光绪）涑水县志》，一收在卷末，一收在卷十，前者是后者的节略，不过删去首尾数句而已。段氏之文重收，与未能先行编目有关；敬氏之文重收，则是鉴别不精所致。这里仅举二例，以期修订时有助于消除类似问题。

可以理解的是，从事如此浩大的工程，无论计划如何周全，也很难做到万无一失，完善只能是逐步的。应当强调的是，这些看似无关宏旨的琐碎之处，往往需要下功夫打磨。在“集体”项目中，最难克服的是粗糙问题。究其原因，常常不在于从业人员的功夫如何，而在于心中是否具有明确的责任意识以及对学术作品完美性的强烈追求。

以上所述，仅为一己之见，而且疏于“元文”研究，难免有失偏颇之处。实际上，这部断代文章总集即使稍有瑕疵，也是瑕不掩瑜，反而令人感觉它的成就更加真实可信。笔者所以不揣弊陋撰作此文，出发点是衷心祝贺李修生先生及其同仁以编纂《全文元》所取得的功绩。而认真阅读这部总集，从中汲取营养，并试图提出问题，以期引起讨论，进而达到完善目的，也许是表达崇敬的更好方式吧。

（责任编辑：石磊）

①《（乾隆）杞县志》卷21《艺文志》，中国方志丛书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1350页。

②中国方志丛书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877页。

③《（康熙）隆德县志》卷上，中国方志丛书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75页。今按：文题原作《灵湫记》，据《（民国）重修隆德县志》卷4《金石》改。

④张沛《安康碑石》，三秦出版社，1991年，第24页。

⑤《（光绪）永年县志》卷37《艺文》，中国方志丛书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982页。

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6年，第174册，第444页。